

青年学术丛书·文化

YOUTH ACADEMIC SERIES-CULTURE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 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李茂民 著

人民出版社

青年学术丛书·文化

YOUTH ACADEMIC SERIES-CULTURE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 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李茂民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余 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 李茂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1368-5

I. ①历… II. ①李… III. ①电视剧-作用-文化哲学-研究

IV. ①J90②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0643 号

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LISHI TICAI DIANSHIJU YU DANGDAI WENHUA JIAZHIGUAN JIANGOU

李茂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368-5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方法	(8)
第一章 文化价值观与文学叙事话语	(14)
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叙事话语	(17)
二、现代文化价值观与叙事话语	(35)
第二章 当代文化价值观与历史题材电视剧	(58)
一、当代文化价值观	(59)
二、当代文化价值观与电视剧叙事话语	(66)
三、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历史题材电视剧	(71)
第三章 历史正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建构	(85)
一、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正剧	(86)
二、历史正剧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	(89)
三、不同话语中的历史正剧及其诉求	(95)
四、历史正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建构	(115)
第四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	(126)
一、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规划	(127)
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艺术表现方式	(133)
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意识形态功能	(138)
第五章 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144)
一、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兴起	(145)
二、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建构	(152)

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策略	(166)
第六章 “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174)
一、文化语境中的“红色经典”和“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	(175)
二、“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	(187)
结 语	(193)
主要参考文献	(196)
后 记	(198)

绪 论

如果把 1958 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一口菜饼子》作为中国电视剧诞生的标志的话,那么这种新的艺术形态和文化现象至今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不过,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这种艺术形态才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众日常文化消费的对象。像《四世同堂》、《篱笆、女人和狗》、《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上海滩》、《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宰相刘罗锅》、《牵手》、《中国式离婚》、《亮剑》、《潜伏》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电视剧,不仅带给人们丰富的审美感受,扩大了人们的精神空间,而且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随着创作水平的提高和电视的普及,电视剧的这种功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电视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表征之一。其中,历史题材电视剧以其历史的厚重感和丰富性,在文化价值观建构中起到其他题材的电视剧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价值观,它是如何形成并发展演变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中起到什么作用,它是如何起到这种作用的,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创作才能使历史题材电视剧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做出回答。

一、问题的提出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总的看法。它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每个人都会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

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由于人员更替和时代的变迁,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我们可以说价值观是后天形成的,每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但既然它是后天形成的,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影响。每一种文化中总有弥布于其中的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称为“文化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观会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促进一个人的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文化价值观包括各个方面,比如人生观、经济观、政治观、宗教观、科学观、审美观、爱情观、劳动观、生活观、权力观、民族观、国际观等等,显然这是一种广泛意义的文化价值观,它基本上等同于价值观。例如加拿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谢弗就倾向于“把一切价值观都看做文化价值观”,^①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②这同样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当然,这种文化价值观中存在着核心价值观。我国有学者认为,这种核心价值观构成了一个自内而外的同心圆的价值体系,即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社会观、政治观、民族观和国际观,其中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最外层是国际观,内核是人类普适的道德观。^③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起支配作用的基本理念。它是衡量和判断事物的终极文化标准。这其中包括历史(是非)观、道德(善恶)观、社会(正邪)观、伦理(荣辱)观、审美(审丑)观等等。”^④

上述对于文化价值观的认识和判断是合理的,因为所谓价值观就是属于人类的,只有人类社会才有价值观,这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而人是文化的人,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现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化价值观看做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普遍认可、奉行和坚守的价值准则。它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体现,所有那些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民族和社

① [加拿大]谢弗:《从文化的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③ 潘维、玛雅:《聚焦当代中国价值》,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7页。

④ 贾磊磊:《中国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光明日报》2007年3月16日。

会都具有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了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就会带来社会和谐;没有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就是社会崩溃的前兆。也就是说,文化价值观的混乱,将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崩溃。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这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区别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标志。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选择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例如,美国更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而中国更强调群体的价值。文化价值观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例如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民主的文化价值就有很大不同,建国初期的国家和集体利益至上的大公无私的文化价值观和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价值观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无论文化价值观怎样发展变化,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还是西方。这说明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一方面具有变异性。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价值观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它是如何起到这种作用,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起到这种作用的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他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长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这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系统)、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立的和私立的学校系统)、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广播、电视等等)、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用暴力手段”发挥其功能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其功能作用。意识形态通过教会、学校、传播媒介、文化机构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使个体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它,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①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它所掌握的意识形态国家

^①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外国电影理论论文选》(下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98—760页。

机器使人们自觉自愿而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通过上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而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也属于整个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文化价值观也正是通过教会、学校、传播媒介和文化机构传承下来,发挥着隐而不见但又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教会、学校、传播媒介和文化机构只是文化价值观传承的机构和途径,而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则是哲学、宗教和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文学艺术最全面地体现了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哲学是通过理性发挥作用的,宗教是通过信仰发挥作用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通过感性和审美的方式对人发生作用的,能够让人在审美的愉悦和潜移默化中接受包含于其中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在文学艺术中得到了类似于“盐溶于水”的表现,成为文学艺术思想和灵魂;文学艺术也会通过抒情方式和叙事方式在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塑造中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和文学艺术具有密切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例如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所表达的是一种崇尚自由、亲近自然的情怀,这种情怀与中国道家的文化价值观具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陶渊明具有一种道家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通过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行动表现出来,也通过他的一系列诗作表达出来。尤其是在这首诗中,这种文化价值观得到了更鲜明的表现。也正是通过他的一系列诗作,这种道家的文化价值观传承下来,成为一种精神营养,滋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同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首诗也体现了为追求自由而不惜抗争和牺牲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反过来说,只有在西方文化价值观中,这种精神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文学作品是如此,艺术作品同样也是如此。像中国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只有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中才能形成,也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欣赏。而西方油画中的焦点透视,只有在西方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文化价值观中才能形成,并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欣赏。

绘画是如此,像园林、建筑、音乐等艺术类型同样如此。因此,艺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与文化价值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在二者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具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文学艺术作品也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塑造作用和渗透作用。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

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这种作用,经典才成为经典,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在大众文化时代,经典的文学艺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发生了改变。“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规划、城市设计、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①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体现了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价值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大众文化形式正在取代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无力关注所有的大众文化现象和大众文化形式,我们仅选取历史题材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形式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探讨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当代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以期对我们的电视剧创作提供指导。

电视剧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艺术现象和文化现象之一,这一点无论是从电视剧的受关注程度还是产品数量都可以得到验证。据《2000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统计,目前国产电视剧的年产量维持在每年12000—15000集,在全国的1974个电视频道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1764个,占总数的89.4%。在各种电视节目中,电视剧的收视市场份额占据第一,成为当今世界电视剧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多年来,电视剧的播出时长一

①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直稳稳占据所有电视节目播出时间的30%左右,电视剧的收视率仅次于电视新闻节目,是中国老百姓最钟爱的电视艺术形式。一部如《长征》、《渴望》这样的优秀电视剧,往往都能拥有数亿观众。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文艺形式都难以企及的。^①“与其他艺术媒介相比,电视剧传播更广、受众更多、影响也更大,它不仅描摹着我们的生活情状,也在构建着大众的思维框架,同时还成为国民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通道。”^②与此相应,电视剧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公开出版和发表的研究专著30余部,论文数百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电视剧的叙事方法和叙事规律所进行的研究,如于君的《电视剧叙事话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李胜利的《电视剧叙事情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戴清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二是侧重于从精神分析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西方文论视角对影视剧的深层文化内涵所进行的阐释性研究,如邓光辉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代影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王昕的《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文化诗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上述研究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电视剧与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的关系问题。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所探讨的是故事的讲述方式问题,怎样讲述一个故事才能更有吸引力;电视剧的文化理论视角研究所探讨的是为什么故事是这样讲述的。那么这样讲述故事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会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在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中能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怎样进行电视剧的创作才能更有利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没有成熟的理论著作,不过有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初步探讨。例如贾磊磊的《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论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当代电影》2007年第3期),作者提出中国的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成为支撑不同电

① 仲呈祥:《电视文艺与发展先进文化》,《中国电视》2003年第1期。

② 魏南江:《中国类型电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影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这篇文章深入论述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开拓了电影研究的理论空间,而且具有深沉的文化关怀。胡立新的《好莱坞大片的极端文化价值观批判》(《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肖青的《“梦”的诱惑:浅析美国好莱坞电影模塑的文化价值观念》(《电影评介》2008年5期)等论文通过对于好莱坞电影背后的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和批判,向我们揭示出任何电影叙事的背后都有其文化价值观作为支撑。总之,上述研究成果在电影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方面做出了理论探索,把电影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不足之处在于:对于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和文化价值观建设缺乏宏观把握;对于电视剧与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的关系问题没有展开充分研究;对于怎样才能使电视剧在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缺乏深度研究。

在我看来,各种题材类型的电视剧都通过一定的叙事方式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观众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文化价值观。因此,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当代文化价值观,通过一定的叙事方式把它有效地传播到大众中去,实现电视剧的文化价值,就成为电视剧创作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本著作无力对所有电视剧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只是希望选取电视剧中的一种重要的类型——历史题材电视剧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典型和代表,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通过对它的历史梳理和个案分析,在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探讨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发展,以及它在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中的作用。我们相信,这种对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和题材的电视剧。所以,为了论题的集中和研究的深入,我们把研究的范围集中于历史题材电视剧。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问题。在中西方文化相遇之后,中国传统价值观就遭遇到种种危机,这种危机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凸显出来,如何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二,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文化价值观。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需要重视电视剧的作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电视剧作品都有其文化价值观作为支撑。

要建构中国文化价值观,应当通过对历史题材电视剧作品的分析,弄清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

其三,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与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文化价值观是通过叙事体现出来的,电视剧的叙事包括人物关系及其命运、叙事线索、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叙事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电视剧艺术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文化价值观建构的效果。

其四,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发展方向。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应当自觉地把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追求,这样,历史题材电视剧就不仅能体现出文化价值,而且也能体现其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能够为当前电视剧创作提供指导,这是本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

总之,在当代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由于不同利益诉求和不同文化的纷争而处于模糊混乱之中。塑造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应当重视文学艺术,尤其是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艺术形式的作用。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应当以塑造良好的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作为宗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历史题材电视剧要塑造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不能靠简单的概念图解和说教,而要靠精当的叙事,讲述人人爱看的故事。“文化核心价值观应当成为一种‘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而不是在叙事情节之外的精神旨意,它应当成为支撑艺术作品故事内容的文化根基。观众通过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直接感触到的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力量,在这种艺术形象的基本精神图景中感悟、理解出的是关于人性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政策的内容。”^①不同时代、不同题材和类型的优秀剧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范本,需要我们把它们放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分析并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和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和任务,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我们倾向于用文化诗学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于历史题材电视剧进行文化阐释,通

^① 贾磊磊:《中国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光明日报》2007年3月16日。

过这种阐释彰显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文化内涵。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文化内涵与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具有密切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阐释,促进我们对于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研究和理解,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文化诗学一词最初是由美国新历史主义创始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提出的。他在文艺复兴文学以及莎士比亚的研究中,一改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将文学放在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联系中进行研究,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症候式”阅读和分析,揭示其中隐含的阶级、政治、性别、身份、权力、种族关系。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虽然他后来也陆续使用了一些别的界定术语,但是只有“新历史主义”一词流行开来并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不过,“新历史主义”一词并不能很好地概括格林布拉特的理论主张,它只是“一个没有明确指涉的措词”,于是在1986年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次名为《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讲演中,用“文化诗学”代替了他过去使用的“新历史主义”。他说:“文学批评论及艺术作品与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有一套术语:我们称之为隐喻、象征、寓言、再现,而最常用的是摹仿。这些术语各有其丰富的历史,都是绝对必要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如果用它们来说明梅勒的书、爱波特的书、电视系列报道、剧本等构成的那种文化现象,它们总让人觉得又不那么合适。不仅对于当代文化现象不合适,对于过去的文化也一样。这样,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新的术语,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信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财产”。^①这就是格林布拉特所理解的文化诗学。在他这里,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文本的扩张有着内在的逻辑,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文化文本,二者都是“审美财产”,只要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都应当进行阐释实践。当然,这里所说的审美绝不是康德意义上的无功利无目的的审美静观,而是能够给人带来快感和兴奋的消遣娱乐。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快感,主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审美性和自律性的文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吸引大众眼球的文

① [美]斯蒂芬·格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见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化热点。既然文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文化现象,那么为什么不转向“文化诗学”呢?

1993年,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这篇讲演稿和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的几篇论文,于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就作为一种最新的西方文论进入到中国的文论话语中。随后,王岳川、张进等学者对这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希望它能够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和借鉴。

在中国当下的学术话语中,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并没有像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权威理论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国内文化诗学研究者主要是从本土问题和话语出发来对它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至多只是从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中借鉴了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等几个名词并得到了理论启示而已。

我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教授自1999年开始陆续撰文阐述他的文化诗学理论。^①其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庸俗、丑恶和反文化的东西。“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和复归。”文化诗学是“具有当代性的一种文艺理论”^②这种文化诗学理论强调在文学文本的研究中,“实现语言与文化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深层建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贯通。”^③在这里,文化诗学所坚持的仍然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研究。其当代性在于通过对于文学的跨学科

① 童庆炳关于文化诗学的主要论文包括:《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姚爱斌:《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研究,阐发其中蕴含的诗意品格,并以这种诗意品格作为观照现实和批判现实的标杆。跨学科研究保证了这种研究的文化维度,而不是传统的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更不是以往工具论的文学研究;对文学经典的研究保证了这种研究是诗学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对文学经典的跨学科研究的强调之中,文化诗学的理论内涵得到了界定。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在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实践,开拓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在我看来,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文学研究,而且应当并且可以应用于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的叙事文本的研究。这是因为:其一,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看,电视剧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艺术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中心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中心则是今天的电视文化和电视艺术研究,^①而电视剧则是电视文化和电视艺术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其二,电视剧和小说、戏剧等文学文本虽然在媒介和语言上有所不同,但在叙事方式、叙事结构等方面并无区别,既然文化诗学能够在文学文本的研究中开拓广阔的学术空间,那么它在电视剧的研究中同样能够大显身手。正是基于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当文化诗学把研究的对象扩展到电视剧这类大众文化的叙事文本之后,它才能真正成为文化的诗学。

当我们把文化诗学的方法应用于电视剧研究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重视电视剧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任何文本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文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称之为文化语境。对于电视剧这种文本而言,其创作必然要考虑收视率,要考虑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诉求,这就使它必然追求能够拨动观众最敏感的心灵琴弦,让观众获得审美享受和思想意义,并能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认可。要想做到这一点,电视剧的创作就必须从社会的文化语境出发,寻找观众的兴奋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获得平衡,即叫好又卖座。

① 王昕:《在历史与艺术之间: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文化诗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因此,一部电视剧产生的文化语境是什么,就成为我们首先要关注的问题。

其次,文化诗学强调在不同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展开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文化诗学不仅要坚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贯通,而且要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展开研究。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贯通,实质上就是把文本放在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展开研究,通过对于文本语言的“细读”,揭示出它的文化意义。对于文化诗学来说,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因为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在这里仍然是抽象的和模糊的,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我们需要把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具体化为特定时代的历史、哲学、宗教、民间文化等不同门类的文化文本,作为文化诗学研究对象的叙事文本与这些不同门类的文化文本之间存在普遍的互文性关系。在这里,所谓互文性关系就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相互渗透、互为话语资源的现象。文化诗学就是要在这种多种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展开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需要落实在具体的批评阐释之中,所以它不是宏观的和抽象的,而是契合于对象的具体阐释方法。例如刘震云的小说《手机》、葛优和张国立主演的电影《手机》以及陈道明和王志文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手机》就是几种不同门类的互文性文本。这些文本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联系,同时又与当时的谈话类电视节目以及百家讲坛、挑战主持人等轰动一时的电视节目构成了复杂的互文性关系。文化诗学就是在这种互文性关系中进行批评阐释实践,揭示其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再次,文化诗学对于电视剧文本进行批评阐释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文本自身的价值和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使文本研究的知识生产融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建构中。在西方现代学术制度的分科式研究方式之中,一个完整的对象被一个个不同的学科肢解为不同部分分别加以研究,所得到的仅仅是关于对象的某个部分或侧面的片面的知识,这些不同学科就成为现代知识生产体系的零部件。也许从整体上看整个知识生产体系是有机的和完备的,但对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他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研究方式必然妨碍我们对于对象和整个世界的理解。例如对于电视来说,传播学学科生产着电视传播的知识,艺术学学科生产着电视艺术的知识,而电视本身对于现代生活世界的意义却无法得到很好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储备都是以这种分科式研究为基础的,我们作为